



逐点点燃的世界

——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

向天渊 著

文心出版社

逐点点燃的世界

——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



向天渊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
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点点燃的世界——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向天渊著.—郑州:文心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683-582-1

I.逐… II.向… III.诗歌史-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52976 号

出版社:文心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16

印张:9.5

字数:227 千字 **印数:**1-1000 册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978-7-80683-582-1

定价:32.00 元



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落脚在一本书里。

——马拉美

走向中西比较诗学

——序《逐点点燃的世界——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

吕进

天渊要推出新著，我自然非常高兴。天渊年富却力不太强。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是我关注的事之一。我知道，别人用一分力气做出的事，他往往得付出两三倍的努力。但是天渊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代的学者。他的学问做得比较深入，教学也富有特色，研究生们很敬重他。

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教师全部是博士。据我观察，他们大体是两路人马：学院派和作家派。学院派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作家派的影响主要在诗歌界。两路兵马倒是能和平共处、互爱互补的。天渊显然是学院派。就拿这部著作来说，他很遵从学术规范，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做到了：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显示了学院派的本色。

我这里所谓的学术规范，包括内在联系紧密的互动的三个方面：学术评价规范、学术管理规范和学术研究规范。近年来，学术规范受到产业化和官场化的强力破坏，日益严重的失范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术领域不再纯洁和高尚，成为我国学术事业发展急需突围的困局。

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更多地涉及官场，这里且不说它。就学术研究规范来说，最基本的规范我以为就是学术忠诚原则，我想这应该是符合学

术规律、体现学术道德的学术领域的行为准则。大学是新思想的策源地、新文化的孕育地、新学术的诞生地、新人才的培育地，没有学术规范怎么得了？而求实规范是学术忠诚的集中体现。科学是求实者的领域。搞科学就得有求实精神，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后者检验的理论，是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运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假如说理科的检验标准是实验，那么，社会实践就是文科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经不起社会实践检验的理论，无论它贴上什么标签，无论它如何头头是道、口若悬河，都是伪科学。

学术研究规范绝不是舶来品，我国早有几千年的传统。是的，在古代，的确有由于书籍流传的困难，引用时只能取其大意，类书不注明出处；故意作伪等现象。但是，在我国，儒家典籍的传承与解释，为《史记》、《汉书》作注释的学者，都不但署名，而且很讲规范的。

天渊这部书，已经孕育了十几年。前两章是中西比较诗学发生、发展的概括性论述，作者有根有据地言说了自己对中西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后几章里，他标举出王国维等八位他认为较有分量的比较诗学家，分章介绍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得失。史和论的有机结合，我以为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从只研究“事实联系”的法国学派，到进行“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比较文学学科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比较诗学之实先于比较诗学之名，但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诗学也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比较诗学现在已经是一门打破时空、地域、学科局限的世界性学问。我想，绝对地说，比较是一切学问、一切思辨的基础，比较性思维是一切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思维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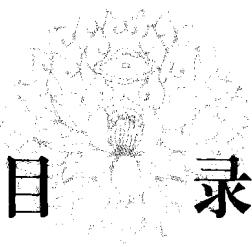
中西诗学互阐，能够使中国诗学立于更加开阔的空间。我记得拙著

《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章就是：“诗学：中国与西方”。在这一章里我提出，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感谢学术界的朋友们，这一章被引用的次数不少。同时，中西诗学的互相阐释，也可以突破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粉碎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让西方以及东方自己“发现东方”，让左手也知道右手做了什么。

天渊的书我以为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可以作为年轻人走向中西比较诗学的向导。天渊博士是曹顺庆先生的学生。曹先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我所佩服的年轻的老朋友。我想，天渊的成就和导师是分不开的。还是那句说烂了的话：名师出高徒。

最近杂事实在太多，身体状况也有点“西望长安”，只有写到哪里算哪里，实在不像序言，只好请天渊谅解了。

是为序。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西比较诗学发生的必然性	11
第二章 中西比较诗学概述	29
第三章 王国维:中西诗学的多层次对话	83
第四章 朱光潜:中西诗学与美学的自觉融通	107
第五章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的直觉把握与逻辑分析	131
第六章 钱钟书:超越时空与学科的契悟神通	155
第七章 王元化:“案而不断”的间接比较	182
第八章 刘若愚:努力构建世界性文学理论	200
第九章 叶维廉:中西美学据点同与异的自觉识辨	226
第十章 刘小枫:中西方精神冲突的正解与误解	247
附 录 取容中外,志铸伟辞——四川大学比较诗学学术群体谫论	267
后 记	289

绪 论

1. 在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前辈学者积攒起来的众多成果,经过历史^①的淘洗,往往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能够沉淀下来,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某部著作一旦进入“经典”行列,就意味着具有了超越时代局限的“规范”与“法则”的意义,恰如刘勰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②。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前后,即雅斯贝斯(1883—1969)所谓的 Axial Age(轴心时代)^③,古代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④,他们对人类关切的共同问题提出独特的看法,从而开启不同的文明形式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著述成为人类精神探索高不可及的范本,以至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⑤。

而“薪尽火传”正是维系学术发展的重要纽带!就此意义而言,“学者”可谓是“薪”,“经典”以及蕴藏其中的“规范”与“法则”就是“火”!正因为“经典”具有超越时代限制的特性,它也就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或者说最佳纽带,这种纽带作用的实现与发挥,只能借助于阅读者

对经典的理解与阐释。

“经典”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自身必须具备高度的思想与学术价值之外，还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认识水平等诸多因素相关。而且，即使成为了经典，也仍然会受到质疑与批判，其地位与价值也会被动摇，甚至可能被逐出经典的行列。尤其是后现代以来，普遍人性、普遍价值、普遍规则等统统受到普遍的怀疑与否定，具有超越时代性质的“经典”自然也难逃被否定与摈弃的命运。不过，即便如此，几乎所有的学者仍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判定为“经典”，即便是反经典的经 典。

从可操作层面来看，如何创造经典，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继续演绎已有的经典模式，使其系统化、完善化；其二，在解构既有经典及其标准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经典模式”。前者重在承续传统，后者则重在反叛传统并开创新传统。但无论采取哪种途径，都必须首先熟读已有的“经典”，掌握其规范与法则，然后才谈得上继承、叛逆与开创等问题。这非常类似于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关系：

“接着”哲学史讲哲学，并不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照着哲学史讲哲学，所讲只是哲学史而不是哲学。即令有一个哲学家，完全不赞同以前的哲学，即令他所讲的哲学，完全与以前的哲学不同，但他亦不能离开哲学史而讲哲学。^⑥

哲学是如此，诗学也是如此。我们要在诗学上有所发明与创造，自然离不开诗学史或者说诗学传统，所谓“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

2. 作为当代中国的学人，我们主要“生活”在“五四”以来的“新传统”

之中。而且,对这种“新传统”的重视,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共识。世纪交替之际,众多学者热衷于描述与反思各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是这种理论共识的重要表征之一。

“五四”以来的传统之所以“新”,就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因素的激烈碰撞中发生、发展的。虽然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文化大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宋元之交、明清之际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南北文化、胡汉文化甚至是中外文化的冲突与交汇,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康乾盛世都可以说是文化交融的结果。但上述南北、胡汉、中外的冲突与交融,几乎都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与交融,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大地的汉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周边民族、长江以南以及来自印度、西方的文化,或者说文化因素,最终都被整合到大汉民族的文化之中。而“新文化运动”却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姿态宣布与“传统”彻底决裂,外来文化尤其是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趁势潮涌而入,今日看来,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大异其趣的中国现代文化“新传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威权主义日渐式微、工业文明对小农经济的巨大冲击、新式知识分子取代传统士子等诸多变化,使得传统政治、经济、教育以及文化模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迅速瓦解,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种子在现代中国生根、发芽。^⑦

中国现代新文化是中外古今冲撞的结果,中国现代新诗学自然也不例外。我们要理解、承传现代诗学传统,必须要弄清古今中外的诗学观念是如何在冲撞与交汇中形成现代诗学新传统的。这也正是笔者撰写《逐点点燃的世界——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的根本目的。

之所以选择“中西”,而不是“中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五四时期的文化冲突,主要是中国旧文化与西方新文化之间“跨文化圈”的“异质

性”冲突,相比之下,其对中国现代文化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属于东方文化圈内的中日、中印之间的冲突;同理,中国现代诗学之形成,从形式与观念两个层面来看,得益于西方诗学之处也远远多于日本、印度以及西亚诗学。其次,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看,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采用的学术话语、思维方式,几乎都是西方式的,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毫无例外地都具有横跨中西的眼界,或者说都是中西比较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诗学领域尤其明显,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人的诗学见解,可谓典型例证。

从王国维 1904 年 6—8 月于《教育杂志》连载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开始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至今已走完百年历程。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与分析,必将有助于中国比较诗学和中国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百年中西比较诗学,与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创作、批评、研究,对传统文论的认识、评价,以及对西方文学、文论的译介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与评价,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上述诸种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逐点点燃的世界——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论》选择了几个在这一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分析他们的文化身份、知识谱系、话语方式以及在吸取、承传中西学术思想过程中的得与失。期望能够聚点成线,粗略勾画出百年中西比较诗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为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做一些铺垫性质的工作。

3. 为了正文阐述与理解的方便,这里将“诗学”、“比较诗学”、“中西比较诗学”等出现频率较高而且相互关联的几个术语稍作界定。

第一,“诗学”。弄清“诗学”概念是理解“比较诗学”和“中西比较诗学”的前提。

据学者考证，在中国古代，“诗学”一词具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诗经》学简称的‘诗学’，一种是作为实践与理论的诗歌学之总称的‘诗学’。”后一意义上的“诗学”，最早出现于晚唐、五代之际，到元代开始流行，并出现以“诗学”命名的著作，明清时期仍然盛行不衰。由于其文类资源与载体主要是“诗”，即汉魏以来文人创作的五七言近体诗，所以它是与古代“赋学”、“词学”、“曲学”等相伴并列的术语。^⑧

作为 Poetics 中译的“诗学”一词，则是中国文艺理论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崭新术语，这既是一种“误译”，又可以理解为“旧词新用”。其文类支撑及其理论内涵基本上源自西方，而且具有鲜明的学科意义。

Poetics 源自希腊词语 Poietike。而 Poietike 是 Poietike technē(作诗的技艺)的简化形式，它确定范本、提取规则以作为评判后世创作的标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最早的一部规范性理论著作。虽然《诗学》主要讨论诗尤其是悲剧与史诗，但就其美学意义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已经关涉全部文学艺术的本质。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可以理解为文学艺术理论。罗马时代的贺拉斯写有诗体书简《诗艺》，17 世纪法国的布瓦洛也作有诗体专著《诗的艺术》，他们都承继了亚氏“摹仿说”传统，也以悲剧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诗艺》针对的是文学创作，《诗的艺术》是新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法典，因此，在贺拉斯与布瓦洛那里，所谓“诗学”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但是，“诗”又是一种与散文、小说、戏剧等相区别的文学类别，“诗学”又可以理解成诗歌理论，比如，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雪莱的《诗辩》、艾伦·坡的《诗的原理》等，都是关于诗歌这一文体的理论著作。就上述情况看来，作为 Poetics 之中译的“诗学”一词，其内涵有广义、中义、狭义的区别，三者分别指文艺理论、文学理论、诗歌理论。就其狭义层面而言，与中国古代的“诗学”术语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本

书所谓“诗学”，主要取其中间层含义，即指“文学理论”。

第二，“比较诗学”。就比较文学学科要求和比较诗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来看，所谓“比较诗学”是指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雷内·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于1949年出版了著名的《文学理论》一书，他们将文学研究区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部分，进而指出：“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文学批评’（其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的）或看成‘文学史’。”^⑨但韦勒克后来又在题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专论中说：“自从这些文字写出之后，曾经有过许多次想取消这些区分或者为这些学科当中的某一学科提出多少带有极权主义要求的尝试：比如说，不是将它们合为一项如文学史或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就是至少把这三项变为两项，说只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只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⑩这即是说，至少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可以相互包含或替换的两个概念。

由此，我们认为，文学理论既包括对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又包括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性研究。比较文学理论或比较诗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原理、范畴、标准，文学批评的概念、原则以及具体作品的评价等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以寻求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比较诗学的兴起，与美国学派提倡平行研究密切相关。因为平行研究主张对没有或缺乏事实联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的美学的研究，从而为文学理论进入比较文学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于1963年在《比较不是理由》（1966年英译本将原书副题“比较文学的危机”用做书名）一书中明确作出了“从比

较文学到比较诗学”的论断,他认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⑩的确,对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对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进行平行的美学的研究,必然要上升到文学理论的层面,进而走向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并最终走向寻求跨民族-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就这一意义而言,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存在着相互促进与影响的密切关系。

再者,正如威廉萨特与布鲁克斯在《文学批评简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造自身即蕴涵着文学理论,《荷马史诗》开篇即祷告上天赐予灵感,这之中就隐含着一种特殊的文学理论,即文学来源于灵感,与作家的经历、学识和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对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就蕴涵着对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第三,“中西比较诗学”。实际上,最近 50 年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艾氏的预见是正确的,而且还展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那就是跨东西方异质文化(或称跨文明)的诗学比较研究,往往比西方或东方文化圈内部的诗学比较研究具有更大的价值。究其原因,应该是由于东方或西方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相互影响大,共同点多,差异性少,而属于东西方异质文化圈的文学理论,相互影响小、反差大、对比度强,因此参照价值就更大,不仅有利于给不同民族-国家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资源,还会借别人之光照亮自己,从而加深对本民族文学及理论的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须认识到,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世界文学这样一种伟大的理想,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与诗学比较研究,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正是从上述意义而言,中西比较诗学是比较诗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如钱钟书所指出的那样,所谓“西方”有“欧洲之西”与“印度之西”之分别。但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欧洲之西”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曾经对中国文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印度之西”。明清之际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⑩正是指包括天主教及各种自然、人文科学知识在内的欧洲文化的总称,近代以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则指欧美文化的东方化、中国化。^⑪也正是在新颖、先进的欧美西学的冲击之下,厚重、古老的中学才开始了躁动但却执著的现代转换历程。而投身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学者们,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以一批颇具分量的学术论著架起了一座沟通中西方诗学的桥梁,通过这座有形而又无形的学术之桥,一方面将丰富的西方诗学术语、观念,尤其是一整套高度系统化的诗学思维与话语方式引进中国,另一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诗学观念与思维的同时,与其他众多的比较文学著作一道向西方输送了诸如“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精神与策略,为解决当前世界文化冲突以及其他种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面对丰硕的中西比较诗学成就,我们理应作出及时、恰当的阐释与评价,让这些在比较中逐步成熟的诗学思想焕发出强健的活力,成为正在建构中的现代汉语诗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注释:

- ①此处所谓“历史”,不仅指客观的自然“时间”,更是指叙述、描述意义上的具有文本性特征的历史,如思想史、学术史。
- ②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当然,刘勰所宗之“经”,是由孔子编订而成的《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
- ③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将中国、印度、西方看

做精神发展的三个递进阶段，雅斯贝斯反对黑格尔的观点，以“轴心时代”为基点，建立了他的新历史观。

- ④古希腊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中国有老子、孔子、孟子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米利等犹太教先知。尽管不少学者继雅斯贝斯之后探讨这一问题，但对产生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原因，至今仍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详细论述请参考张灏《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载《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⑤[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 ⑥冯友兰：《论民族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1984年版，第434页。
- ⑦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尤其是站在二者背后的李先生（自由，Liberty），在很长时间甚至至今仍然未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方式和现实力量[参见《李敖论五四》（1989.4.29），载《李敖精品文集》第195—199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但其对新传统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埋没也不容抹杀的。
- ⑧参见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262—280页。
- ⑨[美]雷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 ⑩[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 ⑪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